



中共中央机要交通局

第三辑

党内交通史料选编

第三辑

(内部读物)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

目 录

党内交通工作片断	许光庭(1)
哈尔滨秘密交通站	刘志敏(11)
空中交通线	陆元斌(17)
汤县第十二交通站	赵子卿(20)
我们的秘密交通线	张大中(29)
神交通	(34)
背着粪筐送情报	宋尚忠(39)
给党传送文件	冯树章(42)
我是有名的大胆儿 ——忆交通工作中的片断	吴瑞英(47)
任河县八区秘密交通站的情况	杨明义(54)
党内交通的组织形式	杨连山(56)
在区交通站工作	李献跃(61)
民兵英雄王福熬勇送情报	张树文(66)
冀南五分区景县交通站	姚建华(71)
夜间送信	董延俊(75)

我在天津做地下交通工作	何志文	(77)
铁路武交队	童新远	(84)
护送邓小平同志去延安	姚 兰	(91)
回忆战争年代河南党内交通工作	杜征远	(100)
四十年代初期河南地下党的交通工作	崔贻钦	(118)
地下交通显神威	徐德义	(127)
打通去中央的干线	管兆修	(134)
赤胆忠心为革命		
——回忆山东战邮交通员的英雄事迹		
武装交通队	刘忠孝	(155)
机智勇敢的小交通	韩 川	(159)
苏北盐阜区敌后交通(邮政)工作	王雨沛	(164)
淮安县交通员英勇斗争的事迹	王雨沛 夏建中	(173)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张承宗	(175)
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	曾昌明	(185)
巧过封锁线	邵剑秋	(193)
地下交通线上的日日夜夜	姚明达	(201)

浙东在上海的地下交通站

.....	李青山 胡其清(215)
风雨交通站	路 云(222)
盱凤嘉县的党内交通	吴学英(229)
吉林区交通站	徐笑奇(236)
广东大埔通往闽南的交通线	刘 旭(239)
石印交通站	叶左恕(258)
“三八站”	李子芬(261)
战斗在新兴县宠洞村交通站	鲁 焰(267)
敌后交通线	张进先(276)
红色联络站	高天梅(285)
西山送信	黄荣章(293)
抗战时期川东特委党的交通	林 蒙 胡 明(298)
我做川东特委的内交通	陈予人(304)
关于地下撤退站	林 蒙(306)
云南地下党的一些交通、情报工作	李沛生(308)

党内交通工作片断

许光庭

党内交通是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尤其是党处在地下环境中，更为重要。她是沟通上下关系的纽带，也可以说起着血管的作用。党一向重视交通工作的建设。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党的交通部门，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了第二科；后又成立了机要交通局（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抗美援朝开始后，成立了全国性（包括朝鲜前线）的军邮系统。朝鲜战争结束后，撤销军邮改为机要交通。党内交通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人员随着工作需要而变动。党内交通工作大体上可分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个阶段，各有各的条件和特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一九三四——三六年之间），我没有当过正式交通员，但是代办过这项工作，经常往返于塘沽和天津之间。除了汇报工作和领任务外，顺便带些党刊，如《火线》、《斗争》、《华北烽火》和《华北评论》半公开刊物。带的方法是到商务印书馆或世界书局买几本杂志或书，用它的包书纸把文件

包好，拿着上了火车放在行李架上，人坐在对面，若有人问，不理他，实在需要作答时，就说刚才好象有个人放在那里的。可是每次都没有人问，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往返多次，没出过事。后来上级领导同志知道了，和我说：“一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应该带文件。”我当时是塘沽党的特别支部书记。从此我就不带文件了。

二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由白区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在延安遇上在天津一起工作过的于克成同志，他在中央组织部二科（交通科）工作。他叫我毕业后到二科去工作，这是党的机要工作。八月在抗大毕业后，经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二科。二科科长是王林同志。经过短期的学习，不久被派到西安交通站工作。站的负责人是刘维同志。分别担任各线路交通工作的交通员有褚景堂、吴国天、王少卿、王凤山和许荒田等同志。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这时日寇已占领了山西的风陵渡，正隔着黄河炮轰潼关至阌乡段。晚上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汽车送我到火车站，我带着文件和公开书刊，坐陇海铁路快车转往汉口。我一上车见有一个人躺在车厢的那头，我在这头坐下来，整节车厢就我们两个人，各坐各的，谁也没理谁。火车到了潼关前一站，为了不暴露目标，车停下来，烧汽、压火，熄灭灯光，然后悄悄地由潼关开到阌乡。闯过炮轰地段，又要躲避敌机的轰炸，所以时常下车。到郑州时，不能继续前进。据说前边铁路被敌机炸坏了。

这时车上的旅客多了起来，有个军人坐到我的对面，他是

武汉驻军。我盘算着，我没到过汉口，临前线近的地方，检查一定很严，怎样安全通过检查，到达汉口办事处完成任务？这个人是否可以利用一下？火车停停走走，由郑州走了几天也没过去广水车站。我观察他不买饭吃，谅是车走的时间长，路费带少了。我就主动地和他攀谈，果然我的判断没错。以后买吃的时我总是多买些送给他，渐渐和他搞熟了，知道他原是西北军孙连仲的旧部，有许多朋友在我军工作。谈的比较近乎了。在停车防空时，他主动地帮我的忙。到汉口后，他帮助我把“麻袋”搭出了火车站，检查员连问也没问。原来担任检查的部队，就是他所在部队。他还给我雇了一辆车，把我送到八路军办事处。返回西安时，钱之光同志又交给我新的任务，把中国红十字会一个大队、两个分队的男女医生和护士以及医疗器材护送到西安办事处。我和红十字会的墨大队长搭上头后，就随红十字会发的车皮出发了。当火车到了东篁店车站时，不能前进了，一打听才知道日寇已占领了李家寨车站。我估计日寇占领了铁路线的地方，是不易收复的，即使收复了也不会马上通车。假若国民党的军队溃败下来，这五十多人的安全和两车皮器材必遭损害。在这儿等下去，有害无益，应迅速返回汉口。我向墨大队长提出我的看法和意见，他同意后，我即去车站与站长交涉。这位张站长是个青年人，对我军表示同情，当时满口答应。夜里有送伤兵去汉口的火车，我们这两个车皮挂在伤兵车上，很顺利地返回了汉口。到了汉口，我向钱之光同志汇报了情况，得到钱之光同志的表扬。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去我军前线服务的心切，经钱之光同志同意组织了七辆汽车，奔赴西安。因汉口周围大水，汽车不能行走，只好绕道长沙经沙市、老河口、陕南到西安。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由汉口渡过长江，自武昌出发，夜间到了长沙。经公安，渡长江到了沙市。这里就是三国时代“借荆州”的江陵。休息了一天，出发到了古代用兵之重镇襄阳和樊城。从商南到龙驹寨时，遇上罗炳辉同志。他回新四军去，我向他汇报了沿途的情况。他告诉我，武汉、广州已沦陷，并向我介绍了“长沙大火”和到西安沿途的情况。我们离开龙驹寨当天到了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红十字会的医疗大队很快地开赴前线，为我军服务去了。

回到西安，听同志们说有个别庭芳司令，是内乡和淅川一带的土皇帝，他管辖的地方不交国税，国民党对他也没有办法。他们若是捉到你，准要杀头。回想起来倒有点后怕。

十二月下旬，组织又派我去重庆。这次与去汉口是不同的，当时遇到的是军人，不那么懂政治。这次所走的线路，遇到的将是搞政治的宪兵。武汉和广州已沦陷，国民党正酝酿着向日寇投降，降日必反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重庆比去汉口要艰难得多。这次的任务，除送文件外，还护送参加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走之前，刘维同志告诉我汉中这个卡子难对付。本可不住汉中，但吴芝圃同志在汉中等着，有事要交代。

从西安出发坐的是一辆老“福特”，幸而有位技术高超的杨师傅驾驶。在汉中还好，没怎么为难，没想到在宁强县遇到了刁难。宁强本是个偏僻的县，过了宁强，就到四川境内，检查很严。按规矩对军用车不应如此。我告诉同志们吃完饭都睡觉，不要作响。来检查的是个宪兵少尉，他把汽车上的物品都翻遍了，有的书一页一页地看。我看这是故意刁难，就说：“同志（国民党也称同志），咱们都是为了抗日，各负各的职，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宾朋。今天兄弟走到你的管辖区，多方便了，交个朋友

吧！在外供职的人，把路子放宽些，是有好处的。”他说：“是的，是的。”就不那么刁难了。车算检查完了，又要到屋子里看看。我说：“同志们几天行军太疲乏了，都睡了。”一面说着一面把他领到我和杨师傅的住所，简单地看了一下。我又说：“明天要走的很早，不去麻烦你了，重庆有事要办吗？我可以代劳。”意思叫他把护照还给我。果然他把护照给了我就走了。离开宁强到了广元，正好是一九三九年元旦，大家在这里过了年。

我们平安地经成都到了重庆，完成了任务。休息待命期间，帮助办事处做些工作，如陪护董老去防空，给董老抄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案》。有一天周副主席叫我去，把柯棣华大夫介绍给我说：“给你介绍个朋友，他们是印度援华医疗队到我军服务的，要去西安办事处，一路要照顾好。”

返回时，我们尽量不住检查站所在地，避开宁强。这次行车是按计划走的，出了川境，中午到了汉中，我主动下车，向检查站的人员道了辛苦，把准备好的两捆甘蔗拿下来送给他们，没有为难我们，看看护照就放行了。一路平顺地到了西安办事处。

一九四一年我被调到中央机要交通局。负责人是吴德峰同志，由任弼时同志亲自领导。后分配到晋西北站工作，站负责人是宋任远同志，后来他回延安，由我负责。这个站的任务是把派遣到敌占区的同志送出根据地。经我送出的有去包头和太原的两起。出发以前，让他们看一些敌伪报刊，熟悉敌占区的情况，研究工作方法与一些技巧。到游击区给他们搞“良民证”，找能带出根据地的统战关系，把能在敌占区住下去的一切手续都办理妥当。到敌占区比国民党统治区要难得多。

三

日寇投降后，我们由延安出发，日夜兼程奔向东北。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到达沈阳。在东北局，见到林枫同志，叫我干老行当，组织部调了一些经过冀中“五一”反扫荡锻炼的县区干部，有张殿恒、周学、肖纯、肖杰、李佩绅、申万祥、王铭周、范树涛、王敬、李强、周恩来、康鸿勋、张惠民、郭俊廷、李振伦等同志，组成东北局交通科，我任科长。

当时东北刚解放，人地两生，又非常混乱，到处打枪，每天都有被打死的人。

伪满的军、警、宪、特，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他们到处为非作歹。当时苏联与中国政府有条约，东北必须交给国民党政府，苏联红军只能在暗中给我们一些资助。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东北局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由沈阳转移到了本溪。一九四六年元旦，彭真同志作了形势报告，要交通科分别传达到北满和西满与陈云和李富春同志。这次任务是我布置的，由肖纯同志执行。鉴于当时东北局和北满分局联系时有中断，确定不带文件，要肖纯把传达的问题写成文字，背熟。肖纯同志没有去过哈尔滨，不熟悉，而申万祥同志少年时期在哈尔滨学过徒，还有一个亲戚住在哈尔滨，决定叫他同肖纯一块去。他们到哈尔滨时在这个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雇马车去宾县。当时，北满分局住在宾县，对外称松江军区。分局书记是陈云同志。到宾县找到了分局，陈云同志接见了他们并当面作了指示，

肖纯同志记录下来，晚上背熟，然后烧毁。第二天分局机关派车送他们到哈尔滨郊外，他们又雇马车回哈尔滨，住在中苏友好协会。两天后经哈尔滨乘火车到辽阳下车，又由辽阳步行回到本溪。回本溪后，又按记忆写出书面材料。过几天向彭真同志、林枫同志当面作的汇报。

去西满与李富春同志联系的是周学同志。这条路线要经沈阳转新民县往西北到齐齐哈尔。但怎样走呢？需要有一个向导，只要带到新民县，以后就可以自己走了。碰巧，我们刚到本溪收下一个青年，经了解他是新民县人。我们研究，叫这个人带着周学。出了新民县以后，这个人就开小差了，剩下周学同志自己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边走边打听，非止一日，到了齐齐哈尔见到了李富春同志。又开辟了一条线路。

四

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开始了，我正任佳木斯市委书记。十二月份接东北局电报，交待工作后到东北局报到。全国成立军邮局，让我筹建东北军邮局（包括朝鲜前线）。任命我为局长，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双重领导。以东北局和省委交通科为基础，根据需要设一办公室和一、二、三科，办公室主任张建；一科科长周学，二科科长张××，三科科长申万祥。建立保密、收发登记、保管、传递等项制度。

将东北境内与朝鲜前线的所属部队都编成代号，登记所驻地点，以便投递。

在东北军区军事通讯学校训练了专职交通人员。

在有邮政车的火车上开辟军邮办公处，沿站投递和接收。

派出人员在朝鲜前线每个后勤分部设一个支局，必要的设站。共设五个支局和几个站。由局派出人员去建立。

辽宁省军邮分局，设在安东（现丹东市）。去朝鲜前线都要经过这个分局，它任务重，所以人员与车辆比其他分局多些。分局局长是王达同志。

由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五一年四月，东北境内各级军邮组织都建设完毕，已开始工作。朝鲜前线一面建立机构，一面工作。

为了掌握朝鲜前线交通情况，我和申万祥、门常玉等同志先到安东分局，听了王达同志的汇报后，傍晚过了鸭绿江到了朝鲜。沿途都是美帝国主义飞机炸的瓦砾，几乎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就连稻田地里都是炸弹坑。桥梁炸塌了，路炸断了，汽车不能开灯，全摸着黑走，时常发生事故。过了顺川，第三天到了成川君子里。在这里召集了能来的几个支局局长开了会。这里比较隐蔽，有我们的电台组，山洞里有朝鲜的兵工厂。

由君子里到三登，是一夜的路。三登是后勤一分部所在地，有一个支局在此。后勤一分部住在山洞里，见到了李承昆部长和孙力余政委。支局住沟口的平房里，见到了支局局长刘存义同志，了解了支局的情况。有一次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顺着山沟低飞过来，把我们堵在房子里，大家就地隐蔽未动，当敌机飞过去时，就向防空洞移动，又飞过来，再隐蔽。我看到同志们所处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艰险的。但是，大家对抗美援朝的认识比较清楚。以艰苦为荣，善于思考，机智勇敢，是可以打破敌机封锁的。如从阳德到君子里的军邮车，就是大白天开过来的，并且安全到达。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是十分热爱的。我们由君子里去三登几天不回来，他们就放心不下。等我们安全

返回时，“阿妈妮”（朝语妈妈）特别高兴。

八月我到北京参加军邮总局召开的全国军邮工作会议，对工作方针更明确了。军邮由初建走上正常阶段，各方面都有了秩序，今后就是巩固和完善了。

全国军邮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我将会议精神，在东北各分局局长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做了部署，后来我接受了新的任务，调到满洲里地区工作。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以后，军邮局体制有了改变，撤销军邮局改为东北行政区机要交通区局，后又改为省交通局，省交通局又改为省委交通科。

在朝鲜前线牺牲了三位军邮战士，他们为党的交通工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永远值得交通工作者追念的。

还值得记述的是申万祥同志。他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到东北局交通科，无论在交通科还是在军邮局，他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们转移到哈尔滨，与东满的陈云和肖劲光同志联系，他几次往返哈尔滨与临江之间。那时候由哈尔滨到临江是件不容易的事，这地方全是山区，完全靠肩背，每天背几十斤重的“东西”，跋山涉水数十里，同时走的全是新解放区。饿了啃点冷苞米面饼子，冬天渴了吃几口雪。申万祥同志没叫过苦，总是情绪饱满地去完成党给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他从哈尔滨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党中央联系，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副主席，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申万祥同志在组建东北军邮局工作时，是三科科长。他长期从事党的交通工作，热爱这项工作，对东北和朝鲜前线党的交通工作是有贡献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

(本局业务处征集)

哈尔滨秘密交通站

刘志敏

我家住在海伦县城内，小时候念了三年书。一九三〇年我十九岁，与海伦县城的李雷炎同志结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到处杀人放火，残害百姓。李雷炎见此情景，义愤填膺，毅然离家，参加革命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一九三二年初李雷炎回到海伦，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用家里的一间房子开设了一所“三三医院”^①，以此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党的秘密交通站。院长李雷炎，还有两个医生，我的身份是院长的家属，实际是和李雷炎一起做秘密工作。凡是路过海伦到哈尔滨开会或巡视工作的我党人员都住在这个医院，我给做饭吃，他们开会时我给放哨。发现有可疑的人就出来装做看病。李兆麟同志常常到“三三医院”指导和帮助雷炎开展工作。以后雷炎同志离开海伦，受党组织的派遣到珠河县工作。我也提出出外参加抗日工作，李兆麟同志同意我到哈尔滨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时家庭阻力很大（父亲去世，两个弟弟还小，母亲不让走，婆婆公公也拦阻），但是

① 注“三三医院”三个人开的医院的意思。

我抗日的决心更大。

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天，我身穿藕荷色的旗袍，按照李兆麟同志的指示，来到了哈尔滨。李兆麟同志亲自到火车站接我，并把我送到道外的一家客栈住，我在店簿上登记的名字是刘淑琴。他说：“小刘，你先在这里住一宿，明天来一个女人接你，她穿翻毛皮大衣，南方口音。”第二天，来接我的是赵一曼同志，她把我接到道里中央大街的一所俄式小房子里。那时赵一曼同志的爱人刚刚被捕，敌人对她十分注意，她不便出门，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交通工作，外出送信、转递文件和买生活用品等。我们的饮食很简单，我的生活费用都是组织发的。赵一曼同志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穿戴是富人或大学生的模样。我有时装扮成学生，有时又是女工的装束。虽然赵一曼同志爱人被捕了，但她照常做革命工作。

有一天冯仲云和薛雯夫妇来我们这里，给赵一曼同志布置了去“老巴夺”^②建立关系的任务。我和赵一曼同志两个人，天天在“老巴夺”烟厂门口堵下工的工人，问她们：“你们这里还用女工吗？”这样天天去堵，天天去问，花费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认识了两个卷烟的女工，并和她们拜了干姐妹，有时下班一起走，了解工厂情况，厂长对工人好不好？工资开多少钱？女工说：“挣不多少钱，刚够维持吃的，来晚一点都不行，日本人很凶，我们不来做工是不行的，一天不来生活就够呛。”

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间，有了解赵一曼同志的人被捕，组织为了赵一曼同志的安全，便调她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后来赵一曼同志被捕英勇牺牲，敌人说赵一曼“红装白马，山腰

^② 注：“老巴夺”当时是外国资本家在哈尔滨开办的烟厂，即现在哈尔滨烟厂。